

发现美食就如同她当年“艳遇”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

钟洁玲是花城广州的知名“生活家”,美食热爱者,专栏作家。天生一张馋嘴,指望美食济世。读中文系的时候,她渴望过游书梦笔生涯,打算走万里路,吃万顿饭,却未尝读过万卷书。毕业时天掉馅饼,她捡到了一份“看小说,拿工资”的好差事,到花城出版社当小说编辑;编辑之余觅食,觅食之余码字,所幸认识一群有食无类的杂食主义者,结伴四处快乐觅食,以舌尖探险,开始美食耕耘。多年来,在全国各大报刊开设“食有八九”、“结庐人间”、“舞文弄墨”、“流水席”等专栏。该书是作者的首部美食作品,发现美食就如同她当年艳遇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钟洁玲是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在花城广州,她被认为是最会吃的美女作家。《此味只应天上有——钟洁玲快乐美食之旅》以沁人心脾的美妙文字记录了这位美丽的饕餮之徒寻吃品吃的传奇经历,这不仅是一部妙趣横生的饮食美文集,还是一部饶有韵味的梦笔生花的白领小资文化读物,更是这位美女作家的一部生动传奇的个人心灵史。

《此味只应天上有——钟洁玲快乐美食之旅》钟洁玲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6.00元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身份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名气之大,不在于他个人在历史中留下过几多痕迹,而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被选入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代人。作为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始人、中国通的司徒雷登,只剩下了一副面目苍白又平庸可怕的面具,人人知道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代表,但又不清楚他具体犯下过哪些滔天罪行。于是,这些鸿泥雪爪被整齐一致的教育事业所湮没。

■ 回忆录

○陈 祥(书评人)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他即将离开北京,南下赴任的前夕,一个中美协会为其举办了告别会。就在这个会上,他遇见了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胡适。彼时的胡适,刚卸下驻美大使的重担,他将在9月份上任北大校长。一个从校园走向政治,另一个从政治回归校园,两个人的命运在这一刻无声交汇,足以构成一个从个人到中国现代史历程的轮回。

此后的中国政局,由重庆的谈判桌走向兵戎相见,国民政府江河日下,在风雨飘摇中撤离到台湾一隅。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上午七点四十五分钟,我终于飞离南京,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便抵达冲绳岛。”而胡适,则于同年4月6日,坐船去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大陆。胡适在走前反复念叨着陶渊明的诗“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以及给石涛画册的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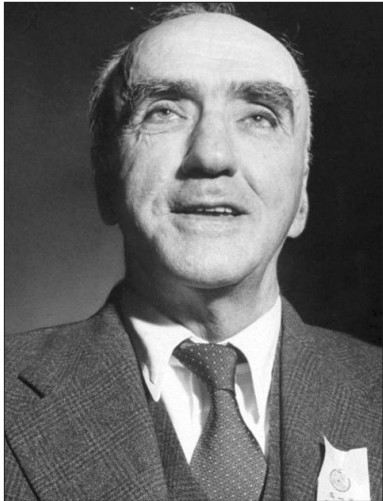
走上飞机,登上船,就是半生的魂牵梦萦。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埋葬在杭州,久远的时光让老人的遗愿得以实现。这一刻,距离他离世已经长达46年。2008年,民国史研究早已风靡全国,该知道的真相,很多人已经知道,已经如梦初醒,他们在心头愉快地说,司徒雷登回来了,告别不了的司徒雷登。与司徒雷登在同一年去世的胡适,则一直没有移柩到大陆。

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父亲在中国传教多年,他们一家长期居住的街道,得名为耶稣弄,在今年,曾激起过耶稣弄的拆迁保卫战。

司徒雷登从小学会了一口地道流暢的杭州话,等他去了金陵神学院,又学会了南京方言,到了北京则学会中国的官话。从这种语言天赋里,便能见到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这里面杂糅了童年的美好回忆,青春的风采。

11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回到了美国,但根据司徒雷登的回忆,他在美国感到了不习惯,这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文明的差异。在美国,



司徒雷登(1876~1962)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

他过完了学业生活,于1904年回到中国,进行传教事业。在他的时代里,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一度如火如荼,众多年轻人激动不已地到异国他乡,他也在狭隘的选择空间里彷徨不定,他对中国的愚昧与蛮荒存在后怕,但最终还是来到了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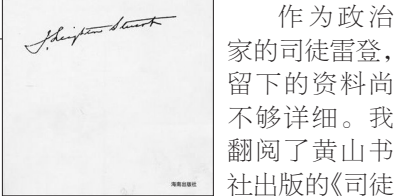
他在杭州参与建立了杭州育英书院,之后去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1919年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段。司徒雷登将《圣经》上的训诫“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结合起来,写下“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暮年时,司徒雷登回顾一生,写道:我坚持认为,人身自由是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和生存前提。没有自由,就算赢了世界也毫无意义。

司徒雷登从开创之初的惨淡经营,费尽心计去争取经费,再到兴旺时期,之后日军占据北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校园关闭,二战结束后恢复上课。然没几年,燕京大学卒于1952年院系大调整,幸有燕园旧址成了北大的新址。与燕大一南一北,同为教会大学的岭南大学,也消亡于这一年。

不强求美国政府的一分钱,依靠民间集资来疯狂办学的美国传教士们,让日本占领军难以理解如此充满渴盼和热心的动机。珍珠港事件甫一爆发,在华北陷区的美军人都被集中关押起来,日本人不断审问司徒雷登,在华办学用心何在。但尽管日本严重伤害了司徒雷登心中所爱的中国,在日军占领北平到日美开战前这段时间里,日本要求燕京大学必须聘请日本学者,于是司徒雷登遴选了70岁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这位日本老学者在燕大封闭之后,住在北平城潦倒过日,却拒绝本国政府的一切援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传教士们普济众生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无私的情怀,已经不是世俗理性可以来分析的。不仅是教育事业上,医疗之上也同样有这种舍己为人的柔情举动,从非洲丛林里的史怀哲,到印度干旱土地上的特蕾莎修女,地球上四处留下圣徒们的迤迤影子。



过非日记全集,仅是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所记,写得很简要,里面极少掺杂个人对时局变化的感情。此外,我觉得回忆录的另一值得关注点,在于司徒雷登对美国《外交白皮书》的反驳。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 中国度过的。我的灵魂与这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人民之间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出生在中国,常年居住在中国, 并和无数中国人成为朋友。我曾经经历了近代中国繁复的政权更迭……在亲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个古老并崭新的文明嬗变的痛楚。”

这是司徒雷登在晚年回忆时的肺腑之言,在华50年于他是生死难忘的经历,于我们是刚擦拭掉灰尘的历史档案。

《在华五十年》[美]司徒雷登著 常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7月版/39.80元

轻灵而厚重的女性故事

如果说善于说故事是桑农轻灵的一面,那么运用史料的功底则是他厚重的一面,作者很好地将二者统一了起来。

■ 文坛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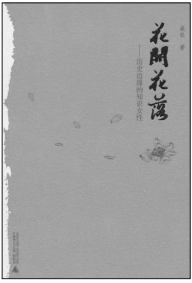
○周 敏(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

近些年,桑农先生关于知识女性的文章,在《书屋》上零零星星地看过一些,其细密的历史事件考证和对女性内心隐情的深入体察,我很是喜欢与认同。现在这些文章集结成《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出版,使我觉得集中阅读,真是一件幸事。

该书一个显著的特色,是擅长叙事。作者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讲说得清清楚楚,又步步设置悬念,以问题的形式层层推进。如《道是无情却有情》一文讲到,1925年徐志摩为避当时与陆小曼的是非远赴欧洲,临行前将后来惹起较大风波的八宝箱托付给凌叔华,可见其对凌的亲密。但是到了异国后,徐志摩在致陆小曼的信中却说,凌已两月未给他写信。此时,作者便不得不发问:“从‘答应做我的通信员’到‘两月来没来信’,其间发生了什么呢?”这自自然然过渡到后面的分析与考证,但看起来自自然然,于不经意间推动文章的走向,其实体现了作者的苦心经营。

作者善于说故事,却一点也没有随意添油加醋地把历史讲成小说。他的文章都是建立在对史料梳理和辨析之上,他不仅能发现到新的史料,还能在旧史料上作出新解。谢泳先生在序言里称自己与作者的“学术

趣味相同”,按我的理解,这共同点首先体现在对历史史料的掌握与把握以及梳理与分析上。谢泳于2008年在《文艺争鸣》上发表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的构想》,提出了一个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却始终未系统表述出的迫切问题,可以说给多少有点空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出了诊断的思路和方法论上的指导,从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读《花开花落》,最叫人惊叹的,就是这种排列史料运用史料的功力。最典型的要数那篇《八宝箱事件之真相》,作者将林徽因得到八宝箱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一天挨着一天地密集地向读者展示出来,仿佛亲临了历史现场,真实地让人都有点喘不过气来。到今天,我才知道“逼真”二字的真意,真实到一定程度就是让人有一种逼迫感。当然,由于史料的缺失和时间的隔膜,那个“自在”的历史已无法还原,对这一点作者也是很有自觉的,他恪守着史家的底线,首先是有一份史料说一话,在此基础上,才做出大胆的假设,所以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令人信服的。如果说善于说故事是作者轻灵的一面,那么运用史料的功底则是他厚重的一面,作者很好地将二者统一



了起来。该书以“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为标题,剖析晚明至民国众多知识女性的命运。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历史是指“他”的故事(his-story)的话,那么这本书处理的“她”的故事确实是处在历史边缘的故事。而作者努力以“她”来结构故事,凸显的是她们和那个大时代的关系以及其中的沉浮故事(所谓“花开花落”),这使得书名具有了某种反讽意味,张力也在此显现。作者虽是男性研究者,但对男性霸权与男性中心采取的是反省和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在《还将遗事辨丁香》中,作者澄清了顾太清与龚自珍之间所谓的暧昧关系为子虚乌有,但作者显然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子虚乌有的事情会被后来者津津乐道?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成全龚自珍风流潇洒的公众形象,就自然需要牺牲掉作为女性的顾太清。所以作者正话反说,似乎有点悲愤地感叹道:“这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本不是特别稀奇的事!”而在写萧红的那篇文章《何人绘得萧红影》里,作者更是毫不掩饰地指责与萧红有过亲密关系的萧军、端木蕻良等的自私、失策、冷酷与背叛。这种鲜明的立场,大大加深了文章的力量与意义。

《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桑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26.00元

■ 编辑推荐

《老师曹禺的后半生》梁秉堃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9月版/33.00元

该书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的学生梁秉堃根据自己跟随先生数十年的耳闻目睹以及翔实的资料,书写的生动感人的真实故事,同时对曹禺先生的后半生以及他经历苦难时的心路历程也做了客观的描写。书中还生动地描写了曹禺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来往,最为令人动容的是“文革”期间他所遭受的以及他对我国戏剧事业所倾注的心血和毕生尽力,不得不让人感慨。另外,书中还配有数十幅鲜见而生动的历史照片,让读者了解这位戏剧大师的生活和事业,以及他的人生境界更为直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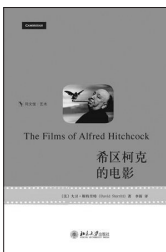
《小说的艺术》[英]戴维·洛奇著 卢丽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9.00元

该书是英国小说家、文艺理论家戴维·洛奇所著的小说艺术赏析。它为一般读者提供了欣赏小说这门艺术的方法,也可以作为学术理论的入门书及写作技巧的指南。该书分为50个篇章,从50个方面,对小说艺术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每篇引用一到两个小说片断,在对文本作细读分析的基础上,展示了小说技巧的方方面面,既有传统小说中的开场白,细腻的人物刻画手法,也有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特有的意识流、元小说等理论。书中的大多章节曾在报刊杂志作为专栏文章登载,内容涉及范围极广,几乎包括了英语小说史上古典和现当代的每一位大作家,如菲尔丁、萨克雷、奥斯特、亨利·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贝克特等等。书中行文既浅显易懂,又专业准确,可以作为小说学习和写作的教科书、参考书;作者风趣幽默、兴味盎然的文笔,又使之也适合于大众读者的口味。该书初版于上世纪90年代,曾上榜英国非小说类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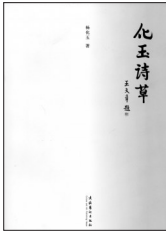
《希区柯克的电影》[美]大卫·斯特瑞特著 李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28.00元

在艺术电影领域享有盛誉,又街知巷闻,这样的导演没几个,希区柯克就是其中之一。该书纵览了他漫长而多产的职业生涯,审视了影响他作品的因素、贯穿其多部影片的主题,还有过去重视不够的希区柯克的“在场”——包括众所周知的出镜和借用角色作为替身,探讨了两个希区柯克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严肃的甚至拷问式的艺术家,一个是爱开电影玩笑的魔术师。进而深入分析了希区柯克的关键影片:《讹诈》——他的第一部有声片;《心声疑影》——他的冤儿;《伸冤记》——质问有罪与无辜的本质;《迷魂记》——他最深奥的作品(有争议);《精神病患者》——他最凶残的作品,探讨邪恶的本性;还有《群鸟》——他最后的杰作,也是他误读最多的影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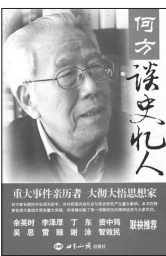
《化玉诗草》杨化玉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9月版/58.00元

该书是作者杨化玉的最新诗集。自1977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与诗歌结缘开始,作者便以诗为伴,书写人生,至今已有30多个春秋。但收入该诗集中的作品大部分是作者写于2004年至今的新作。这些新作的视野宽阔、题材、形式多样,其中既有七言、五言古体,又有汉俳、长短句,还有新诗;内容则记事兴怀、景观记游、状物咏史、颂今忆往,人生百感,世间万象,纷纷汇于笔端。作者以诗人的赤子之心为诗,至情流露,有感而发,情意所至,自成佳篇。写来酣畅淋漓,不事雕琢;读来天然本色,深挚动人。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何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版/39.80元

今年恰逢党史90周年,同时又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该书系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何方撰写的回忆录。该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何方党史笔记的集结。它不是单纯从亲历、亲闻写起,而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具体而微地表述了自己多年的观察心得与体会。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的汇集。新中国成立后,何方曾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六局副局长,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从他的怀念文字中,可看出张闻天、胡耀邦、刘英、陈乐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的伟大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首次披露。感人的文字下,是一个生动朴实的历史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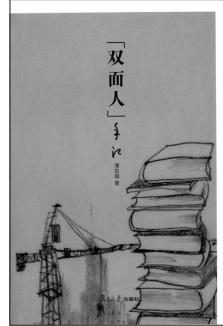


出版人首先应该是读书人

“出版人”应是“文化人、职业文化人、文化商人,这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如果要对此再作进一步阐释的话,“文化人”更应作为“出版人”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而成为“文化人”的第一要义则在于必须读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出版人首先应该是读书人。

■ 自序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篇什都是从笔者近10年也就是开始从事出版工作之余所写下的文字中挑选而出,所选之内容不外乎两类:即出版与读书,此外的一些文字则暂且置于一旁。而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这10年正好也是笔者进入出版业工作后完整的10年,留下些相关文字,聊作一种自我纪念吧。

至于以《“双面人”手记》作为这本集子的命名,既是与该书所涉的出版与读书两部分内容相吻合,更是对“出版人”内涵的一种理解。2006年,我在有幸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奖”的荣誉时曾这样谈过自己对“出版人”内涵的理解:“文化人、职业文化人、文化商人,这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就是我心目中的出版人”。如果对此再作进一步阐释的话,我更愿意将“文化人”二字作为“出版人”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而成为“文化人”的第一要义则在于他必须读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出版人首先应该是读书人,再退一步讲:我心目中所尊重的出版人必须是读书人。

这样的理解在以前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可以回望现代出版史上的那些成就卓越的出版大家,没有哪一位不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有的甚至本身就是某一领域大师级的人物。然而在当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理解似乎正在被动摇,而作祟者就是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市场,以至于有人将出版人首先理解为一个商人,一个所谓懂经营懂市场的管理者,以至于现在确有一些读书甚少乃至不读书者堂而皇之地以“出版人”的身份在出版业内呼风唤雨。我完全否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人的商业属性,也完全承认现代出版人需要懂经营懂市场会管理,但这一切与读书与否并不构成替代关系,只不过是传统出版人的知识结构在现实面前所必须的一种拓展。而这样一种拓展更需要出版人多读书,读好书。很难设想一个读书甚少乃至不读书者如何懂经营懂市场会管理,也很难设想一个在自己的出版专业领域完全外行者凭什么去经营,要知道出版人经营的全部产品就是内容,是文化而不是一般的物质。因此,对读书甚少乃至不读书者却依然在出版业内呼风唤雨的那些“出版人”,即便他们一时间也完全可能将出版业搅动得风生水起,我内心最多也只是承认他们的职业身份而怎么样也尊重不起来的。

收到这本集子中的这些质一般量不多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多少也记录了自己对出版人内涵理解的点滴痕迹。作为出版人,你不能不研究出版的一般规律乃至特殊规律,不能不观察与思考业内现状及应对策略,收在“第一辑:出版人”题下的文字便属于这方面的内容。这些文字除少数为“命题作文”外,其余均系有感而发。由于写作时限前后跨越近10年,因此早期提出的一些问题现在实际已经解决或正在着手解决。现在我依然将这些“过时”的文字留存在这部集子里,一是为了“留此存照”,二则也可见出我国出版业在这10年中发展变革的一些轨迹。我一直认为,对出版规律的研究应该是一种理论与实务高度结合的研究,或者说应该是立足于实务,在大量实务包括案例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寻找总结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坦率地说,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开展得还不够,这种不够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务的脱节:从事专业研究者大都缺少实务的经验,其研究也就多少见出空泛,脱离实际的“玄虚空谈”多,特别是缺乏类似MBA教学的那种对鲜活案例的解析,基本上不具可操作性;而从事出版实务者又多忙于事务,无暇对自己出版实务中以及整个行业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归纳与总结,进行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这样的局面依本人的学识与阅历自然是无法改变的,但我愿意将自己在实务中的点滴观察与思考记录下来,或许也能为专业的研究提供一些一手的素材。作为出版人,你可以暂时不写作,但你不能不读书,收在“第二辑:读书人”题下的文字大抵便是笔者近10年读书的部分写照。现在的一些“出版人”几乎不读自己出版的产品,当然也更谈不上读自己同行出版的产品,以至于一个出版社的社长终审稿件这种再正常不过的职责居然都会引来一番诧异,仿佛出版社的社长不看稿才正常,才是经营者,才是会管理。坦率地说,这样的“出版人”是为我十分之不屑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屑,所以在从事出版管理事务时,尽管十分之繁琐,但我却时时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脱离业务实际,一定不能放弃读书,一定不做那种不看稿不读书却在那里夸夸其谈的所谓“出版人”。不仅要看稿,按捺不住时还要写上几句,既是既往职业惯性的使然,也算是从业的一种记录吧。这些文字大都不长,确有没有太多时间之缘故,更是因为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有一种直白的、坦诚的、简洁的、带读书人体温的书评,而不是那种绕来绕去的、貌似高深的、寡情所谓评论。自己的这些文字大都是第一时间读书后的第一反应而非深思熟虑之作,这当然就有了个人的强烈局限,但话说回来,个人的第一直觉有时又是不无道理可言的,适当保留也未尝不可。

“附录”的两则文字从文体到内容与这本集子都不怎么相干,之所以收录于此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深深的敬意与感激,潘旭澜老师这个人和《文艺报》这张报对我的成长与从业所起的作用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

感谢母校出版社不嫌弃我的简陋与肤浅,感谢师兄贺圣遂社长能接纳这本集子的出版。作为同行,我当然知道这本集子的出版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效益。惟其如此,作为这则“自序”的结束,除了感谢二字,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表达了。

(本文略有删节)

《“双面人”手记》潘凯雄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32.00元